

俄羅斯漢學研究史概述

The History of Russian Sinological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李明濱 (Li Mingbin) *

俄羅斯漢學興起於東正教駐北京的宗教使團，它在北京設立的「俄羅斯館」，竟成了俄國漢學在國外的發源地，這是很有趣的歷史現象。如今俄羅斯漢學已經走過了三個世紀的歷程。

一、18世紀漫長的醞釀時期

經彼得大帝提議、康熙皇帝同意，俄國東正教（基督教的一支）派出宗教使團於1715年到達北京。從此開始了東正教在華的常駐活動。1728年中俄簽訂的「恰克圖條約」進一步確定，宗教使團每屆定員10人，其中神職人員4人，世俗人員6人（包括使團醫生和留學人員），定期每10年換屆一次，駐地有北館和南館之分，通稱俄羅斯館。

宗教使團前後換屆20次，在華活動近250年（1715-1956），在早期兼有宗教、外交和文化交流三種作用。它的地位特殊，經濟來源由俄國政府從國庫撥給，清政府也負擔其成員的一部分生活費，這在中俄兩國關係史上的重要性，曾引起馬克思的注意。他評論道：「俄國同中華帝國的關係是很特殊的」，當英國人「連跟兩廣總督進行聯繫的特權都得不到的時候」，「俄國人卻享有在北京派駐使節的優先權」，宗教使團「使俄國外交在

中國……有可能產生一種絕不僅限於外交事務的影響」。

宗教使團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成果，就是實行中俄之間的文化交流，並造就了一批早期的漢學家。他們一方面傳播俄國國情和文化，包括東正教文化。把宗教書籍譯成中文，如《馬太福音》、《聖禮書》、《日課經》、《八重讚美詩》、《教義手冊》、《教會成語》，直至《新約》等都由他們譯成漢、滿文，還編成《俄中神學與教堂用語詞典》、《俄漢口語詞典》、《中俄音調詞典》等。東正教的一切習俗包括教堂建築都通過他們的活動而首次展現在中國人面前。與此同時，他們也傳播了俄國的風俗與民情。

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典籍，從《論語》、《中庸》到《大清一統志》、《元史》和《通鑑綱目》的部分內容等都由宗教使團首次譯成俄文。他們還首次編成《漢俄大詞典》。在開展中國研究的教俗人員中，有一批人成為有名的漢學家。可以說俄國早期第一流的漢學家都是出自宗教使團。其中有俄國第一批漢、滿文教授丹尼爾·西維洛夫（1798-1871）、沃依采霍夫斯基（1793-1850）、斯卡奇科夫（1821-1883）、查哈羅夫（1816-1885）、佩休羅夫（1833-1913）；有早期的漢學家羅索欣（1717-1761）、列昂季耶夫（1716-1786）、弗拉迪金（1761-1811）、卡緬斯基（1765-1845）、巴拉第（1817-1878）、瓦西里耶夫（1818-1900）和俄國漢學奠

* 作者為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教授、俄羅斯學研究所所長。

基人比丘林(1777-1853)。

俄國早期漢學家的主要學術成就是以大量翻譯注釋和情報資料為基礎，運用歐洲近代科學研究的方法，根據對中國文獻原文與社會現實的直接接觸，來擴大對中國的瞭解和進行研究、作出概括和總結。因而其學術成果不但在當時是綜合性的中國國情報告和總匯，而且在日後具有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意義。

俄國第一位漢學家羅索欣於1741年回國，3月23日受聘任科學院通譯。有一種意見認為那就是俄國漢學起始的日期。他短暫的一生(僅活了44歲)中，主要的事業是翻譯，譯作中所加的大量注釋足以證明他本人有相當淵博的學識。其翻譯手稿約30部，主要為史地著作。譯作《資治通鑑綱目前編》，比巴黎譯出的法文版早了20年，還有五卷本的《准葛爾叛亂平定記》和《八旗通志》(共17卷，他譯出5卷，其餘由列昂季耶夫續譯)。他還從《大清一統志》中譯出一部分，為《阿爾泰山記》。值得注意的是他還譯過《二十四孝》、《三字經》、《千字文》、《漢滿文的俄文轉寫》以及《1730年京報摘抄》、《日本簡史》等。

另一位早期漢學家列昂季耶夫回國後任外交委員會通譯。除了協助羅索欣譯完《八旗通志》，還有大量譯作。在俄國18世紀出版的中國書籍、文章、譯作120種之中，他的著譯佔了15種。其中有許多種屬於歐洲第一次的譯本。如《三字經》俄譯本。屬於第一次公開出版的俄譯本，還有《大學》(1780年)、《中庸》(1784年)和部分《易經》等。重要的中國律法典籍則有《大清會典》(1-2冊，1778-1779年；第1-3卷，1781-1783年)和《大清律》(第1冊，1778年；第2冊，1779年)等。

他的《中國思想》一書係編譯自滿、漢文的各種重要文章，流傳很廣，影響頗大。在1772、1775和1786年共出三種版本(分別為209、209和313頁)，其中收入宋代理學家程頤(1033-1107)的《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和清代《雍正帝傳子遺詔》。

俄國文獻資料中，有第一部全面介紹中國的著作《中國漫記》。它有一個長長的書名《天下第一洲——亞細亞洲，位於此洲的中華帝國及其各省市》，手稿完成於

1677年(後於1910年在俄國喀山出版)，作者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斯帕法里(1636-1708)，係俄國外交官，出生於莫爾多娃的伐斯盧伊縣(位於今羅馬尼亞東部)的米列斯蒂村。該書已有中文譯本，全書215頁，由蔣本良、柳鳳運翻譯，中華書局於1990年出版。

二、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漢學學科形成

經過18世紀近百年的長期醞釀之後，俄國漢學最終成為一門學科的時間，應該說是在19世紀上半葉，其標誌是：1. 出現了見多識廣、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漢學家；2. 漢學成果已不僅僅是翻譯，而是搜集資料、譯介作品進而作分析研究，並撰寫著述；3. 有成形的教學和研究方法，建立了培養人才的院校。

此時的俄國漢學，從僅在國外設立的東正教駐北京宗教使團「俄羅斯館」，過渡到在國內的主要大學喀山大學建立東方系(1807)。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為比丘林(1777-1853)。俄國漢學在初起時，特別在18世紀，主要是從帝俄對外政策和對華貿易的實際出發，搜集情報，翻譯資料，其局限性很明顯，而從19世紀開始，漢學業已超越這種局限，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比丘林的研究恰好反映19世紀上半葉俄國漢學的最高成就。

作為俄羅斯漢學奠基人的比丘林，其漢學學術活動從19世紀初開始，持續了半個世紀，主要有三個方面。

- (一) 學習中國語文，編纂辭書，為學科的建立準備工具書。他先後編成六部字典，如《漢俄辭典》、《漢俄語音字典》以及國情手冊，如《北京概覽》等。
- (二) 漢學著譯成果豐碩。有關中國西部和西北部的著譯作：《西藏志》、《准葛爾和東土爾克斯坦志》、《蒙古紀事》、《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歷史概述》、《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有關中國國家制度、民情風俗的著譯：《中國的民情風尚》、《中國、其居民、風俗、習慣和教育》、《中華帝國統計概要》、《中國的農業》。還有一批未及出版的譯稿《大清一統志》、《通鑑綱目》、《儒教及其禮儀》等。有關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三字經》和

《四書》。

(三) 開辦漢語學校培養人才。比丘林 1831 年在恰克圖創辦了第一所漢語學校，親自任教至 1861 年，培養眾多人才，薪火相傳。所編教材《漢文啓蒙或漢語語法》，先後作為恰克圖漢語學校和喀山大學東方系的教科書，長期使用，直至 20 世紀頭十年，仍是彼得堡大學的課本，1908 年還在北京出版過。

同期著名的有僧侶學者巴拉第（鮑乃迪，原名卡法羅夫，1817-1878），前後來華三次，駐京 30 餘年，所編《漢俄合璧韻編》（上、下卷，1888 年，北京出版）是歐洲同類字典中最為完善的。他的譯作涉及中國西部邊陲地區和佛教經籍，並有《修士大司祭鮑乃迪日記》。所編多卷本《俄國駐北京宗教使團成員著作集》極具史料價值。

宗教使團出身的官員兼學者，還有聞名的卡緬斯基、查哈羅夫、斯卡奇科夫等。卡緬斯基（1817-1878）留有史地、民情和國家朝政的大量譯稿，編有多部雙語辭典，如《俄華例句詳解大辭典》、《漢滿例句詳解成語辭典》、《漢語發音詞典》、《蒙、滿、俄、拉丁語辭典》等，以優異成績當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和古文物通訊院士。

曾長期任俄駐華伊犁總領事的查哈羅夫（雜哈勞，1814-1885），參與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1864）。除長時期執教滿、漢語外，以編出《滿俄大辭典》而聞名遐邇。

至於俄駐塔城、天津領事的斯卡奇科夫（孔琪庭，1821-1883）則以收藏圖書和考察民俗為特色。「其收藏漢籍善本之富為當時俄國之冠」（現存莫斯科國家圖書館）。深入研究民間習俗和文化，已涉及天文、地理、民情風俗，包括城鄉民居生活。斯卡奇科夫曾與農民交友並親身務農，以切身體會撰寫論著：《談談中國的農業》、《中國的烹調》和《我的務農日記》。其文著選題新奇，往往出人意外，如《北京運河上的郊區茶館》、《溫泉鄉石窩農家生活寫生》。

從《我的務農日記》等幾種資料中，可以瞭解到他曾親自種植茶、瓜、豆、穀、花卉、草藥、果樹等共達 343 種，並且餵養家蠶與野蠶。他還寫出了〈論中國蠶

的品種〉和〈中國人放養野蠶的樹木〉等文章。

斯卡奇科夫對農業生產和社會民情的興趣極為濃烈。他積累了大量的資料並加以翻譯，使得他的漢學成果獨具特色。譯稿有《開闢歷史數通書》、《漢代天文史》、《古今米源》、《救荒活民》、《續茶經》、《授時通考》、《尚書堯典》；還有他撰寫的手稿《中國的農業》、《中國的工藝》、《中國的蠶絲業》、《中國的百科全書》、《中國的風俗》、《中國天文學和氣象學研究資料》、《中國書目》、《關於中國地理的描述和筆記》等，可以構成有關中國知識的「百科系列叢書」，連同他在華期間的公文、信件、日記、圖片、各類手稿多達 18 類、數千頁，其中單計農業類一項就多達 2000 餘頁。這些資料悉數存於莫斯科的國家圖書館手稿部。

斯卡奇科夫涉獵的範圍之廣，文稿包括的社會生活方面之寬，不但在俄國漢學家中，而且在世界漢學家中都是罕見的。

此外，他所寫《我的政治日記》不僅廣泛記載了 19 世紀中葉中國農民的生活場景，而且涉及太平軍起義時期北京的情況，極富史料價值。他還在俄國最早譯出《東周列國志》。

三、19 世紀下半葉漢學中心建立

1837 年喀山大學東方系設立漢語教研室，這是俄國漢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標誌著兩個轉移：一是漢學基地由俄國國外轉移到俄國國內，即由駐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宗教使團轉移到國內的喀山（隨後是聖彼得堡）。這不單純是地點的轉移，而且是學術研究出發點的變換，也就是更能從俄國的國情出發來研究中國，同時更能以俄國為參照物來對比中國，以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二是漢語教育由個別漢學家如羅索欣、比丘林等開辦的普通漢語（漢滿語）學校轉移到高等學府，提升了人才的層次，使漢學人才從普通的實際工作者如譯員、經貿實踐人員提升到具有高等教育水準、接受過大學的科學研究訓練的學者，或學者型的實務人員。他們日後就有可能成長為訓練有素、卓有成效的漢學家。

不久以後，1855年根據政府決定，全俄各地如彼得堡、喀山、敖得薩、哈爾科夫等地高校，以及外交部所屬學校所有漢語專業，包括喀山大學東方系均集中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建成了漢學教學和研究的中心。

瓦西里耶夫（王希禮，1818-1900）曾在華居留十年。1851年被聘為喀山大學教授和漢滿語教研室主任。除了講授漢語、滿語，還開設中國史地、中國文學等課程。1855年隨著系科合併轉入聖彼得堡大學，繼續被聘為東方系教研室主任、教授，他任教五十年內為俄國培養了大批漢學和東方學人才。

瓦西里耶夫的著譯豐碩，主要涉及中國的宗教、歷史、地理、文學。有《佛教教義、歷史、文獻》、《10至13世紀中亞東部歷史於古跡》、《東方宗教：儒、釋、道》等。他擁有大量資料，在北京期間購得漢、滿、藏、蒙文書籍849種共2737冊，回國時盡數帶去。後來他在聖彼得堡任教時增開了中國歷史、地理、文學、中國報紙、中國史書、中國文學名著選譯、儒學史、滿語、滿洲歷史、地理和文學、「四書」等課程，對俄國的漢學作了全面的開拓，並寫出《中國文學史綱要》這樣系統的論著。後來，蘇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充分肯定瓦西里耶夫的功績，稱俄國漢學「這個學院派有百分之九十的內容是由他創立的。」

瓦西里耶夫於1866年當選為聖彼得堡科學院通訊院士，1886年升為院士，是俄國漢學家中文學方面的第一個科學院院士。其所著《中國文學史綱要》，屬於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此書頭版用十月革命前的舊俄文字印刷，大32開，計163頁。譯成中文估計有十餘萬字。封面印有：「《中國文學史綱要》（柯爾什和李克爾主編《世界文學史》之一冊），瓦·巴·瓦西里耶夫著，聖彼得堡，馬·馬·斯塔秀列維奇印刷所，1880年。」

該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屬於引言性質，介紹漢字、漢文和古文、古典文獻的相關知識及產生的時代背景。第二闡述儒、釋、道以及諸子百家的學說和典籍。第三為科技、自然科學和文學評介。包括農書、兵法和文學的三種體裁，即小說、詩歌、戲劇的名家和名著。實際上這是一部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綜述和評介，或可稱之為中國文化典籍史（自古代迄於清代）。

瓦西里耶夫還是佛教研究中的俄國學派之重要成員，其他人還有米納耶夫（1840-1890）、徹爾巴茨基（1886-1942）和鄂登堡等。佛教產生於印度，後來逐漸衰微而被婆羅門教所取代。但佛教形成各種派別，已在此前傳向亞洲各鄰國，包括錫蘭、尼泊爾、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地區。有關佛教的文獻非常繁複多樣，包括各種文字的文籍。許多派別的著作在佛教本國印度已經失傳，但卻保存在漢文和藏文中。因為中國人翻譯佛教做得早而認真，已經用漢文和藏文依次、全部翻譯了各派的佛教著作。因而研究早期佛教連同其歷史發展也就需要從漢文和藏文中去考察。這才給了俄國漢學家、藏學家提供了機會。瓦氏成了佛教研究俄國學派的奠基人。米氏注重研究佛教的來源問題和翻譯佛教文獻（尤其早期佛教），徹氏則考察了佛教哲學發展的各個階段，涉及小乘時期、大乘佛教之產生和瑜伽行學派。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世界佛學界的公認。

此時期的俄國漢學還提供了世界第一部中國神話研究的專著《中國人的神話觀和神話》，係瓦西里耶夫的門生格奧爾吉耶夫斯基（1851-1893）所著。格氏為彼得堡大學教授。

國外漢學界對中國神話的研究，要比中國學術界早得多，尤其俄國漢學家更是走在前列。這是由於他們早在19世紀就興起神話學。在歐洲，不僅產生了一般的神話研究理論，而且注意本國和各國的神話，就如同民俗學、人種學、民族志以及宗教學一樣，已蔚成風氣。俄國在19世紀中葉，已經展開記錄民間傳說和英雄史詩，其影響所及，中亞的一些學者也有所動作。而在中國，這方面的學術意識萌發較晚。五四運動前後，才有劉半農等人開展全國性的民歌收集活動；聞一多、郭沫若等人開始涉足神話研究領域，也只是在20世紀20年代。

中國文學傳入俄羅斯，從18世紀便有人開始翻譯，不過，主要的是經由其他歐洲文字轉譯，而且不可能是對原作照譯，而是縮編甚至改寫，致使後人很難查對原作。此外，譯作的數量也很少。19世紀才陸續增多，知名的如1827年翻譯出版的《玉嬌梨》片段，1832年翻譯出版的小說《好逑傳》，1847年翻譯出版高則誠的元

曲《琵琶記》等。據漢學家李福清查對，均係由其他外文轉譯。

19世紀後期瓦西里耶夫譯介古典名著《聊齋》的選篇，包括〈水莽草〉、〈阿寶〉、〈庚娘〉、〈毛狐〉等發表於1873年。而1874年就有譯作王勃的《騰王閣序》。在此之後，有1882年瓦西里耶夫編輯出版的《中國文選第三冊注解》、《詩經》譯和解。如果不算1852年《莫斯科人》雜誌（第一卷）所載的《詩經》選譯和《孔夫子的詩》，那麼瓦氏的翻譯就算是《詩經》最早的成批俄譯了。接著是1896年米哈依洛夫、米勒爾等人譯的《詩經》5首。

戲曲作品更多的是轉述內容或作簡要的介紹。最早的介紹文字是《雅典娜神廟》雜誌1829年6月第11期發表的短文〈學者之女雪恨記〉，實際上是介紹《竇娥冤》的劇情和《元夜留鞋記》的故事梗概。而1839年翻譯發表的〈樊素，或善騙的使女〉（《讀書叢刊》1839年第35卷，作者題名鄭德輝），經漢學家李福清查對，它就是鄭光祖的《伯梅香》，譯者是巴依巴科夫。這算是首次的元曲俄譯。而1880年瓦西里耶夫所寫的《西廂記》故事梗概（載《中國文學史綱要》），也僅僅是為了評介而作的簡短文字。

據不完全的資料統計，整個19世紀發表的中國文學作品的俄譯、評介和內容轉述性的文字僅約50種，其中翻譯作品佔32種，評介文章和論述18種。

四、20世紀上半葉漢學全面開拓

瓦·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於1929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同年，他接到北京圖書館的前身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館長為蔡元培）簽署的公函，正式特聘為北京圖書館「通訊員」（這是給外籍學者英、德、法、俄、美、日各一名的榮譽職銜，阿氏為該館同期聘任的六位外籍學者之一）。這表明，阿氏的成就同時得到俄中兩國的承認。如今北京國家圖書館還珍藏的阿氏成名作——1916年出版的專著《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已屬中國國內唯一的該書俄文原

著初版本。

（一）阿列克謝耶夫的重大貢獻

成名作巨著（大開本790頁）《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從詩學的高度與歐洲的詩論作對比，包括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法國詩人布瓦洛等，確認「司空圖的長詩在世界文學上應當佔有一個極其榮耀的地位」。從而開了中西比較詩學的先河。

阿氏在古典文學和文化研究有多方面成果，如《聊齋志異》、《中國文學》、《中國民間年畫——民間繪畫中所反映的舊中國的精神生活》和《東方學》三部文集反映了他在漢學各個領域的拓展：語文學、民族學、史學、詩學、民間文學、美文學以及翻譯理論和實踐。

畢生從事漢學教學。1908年起即在中東鐵路學院工作，1910-1951年在彼得堡——列寧格勒大學任教。在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提出和推行一系列全新的漢語教學法，造就了一大批漢學家。

阿列克謝耶夫對俄國漢學的特殊貢獻，在於對漢學學科提出了系統的理論，孜孜不倦地建設漢學學科和認真嚴格地培養漢學人才，形成了「阿列克謝耶夫學派」。學派的主要成員有：研究哲學的休茨基、阿·彼得羅夫，研究文學的鮑·瓦西里耶夫（王希禮）、什圖金、費德林、艾德林、費什曼、齊別羅維奇、克立夫佐夫、瓦·彼得羅夫、孟列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研究語言的龍果夫、鄂山蔭、施普林欽、雅洪托夫，研究漢字的魯多夫，中、日兼研的聶曆山、康拉德、孟澤勒，研究圖書資料的費盧格、布納科夫，研究藝術的卡津、拉祖莫夫斯基，研究經濟的施泰因，研究歷史文化的杜曼、齊赫文、維爾古斯、李福清，還有史學家米亞斯尼科夫院士，和現任遠東所所長的季塔連科院士。

（二）漢學多方面開拓

在蘇俄立國的世紀初期，有兩代學者參與新漢學的創建工作。老一代以瓦·米·阿列克謝耶夫、謝·費·鄂登堡（1863-1934）、尼·瓦·屈納（1877-1955）以及曾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第二任院長的德·馬·波

茲涅耶夫（1865-1942）為代表。

新一代有以著重研究中國革命鬥爭的康·安·哈爾恩斯基（1884-1943）、阿·伊文（筆名，1885-1942）、弗·維連斯基—西比里雅科夫和阿·葉·霍多羅夫（1886-1949）等。

新一代的漢學家有不少人親身經歷了中國的革命鬥爭，或參加我國的北伐戰爭，擔任來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翻譯，或擔任孫中山領導的國民政府的顧問，或在蘇俄政府派來駐華的外交機構工作，或當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像當年聞名中國的巴·亞·米夫（1901-1939）。擔任過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主任的格·納·沃伊京斯基（1893-1953），曾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處副主任（1929-1934）的柳·伊·馬季亞爾（舊譯馬紮爾或馬加爾，1891-1940）。

在這個時期，中國古典文學和書籍的翻譯工作也大有進展。曾於後來完成《詩經》全本俄譯工作的阿·阿·什圖金（1904-1964）翻譯家還有尤·康·休茨基（1897-1941）和王希禮等。還出現了一批語文學家，如研究甲骨文的尤·弗·布納科夫（1908-1942），研究西夏文的尼·亞·涅夫斯基（涅曆山，1892-1945）和盧多夫。龍果夫（1900-1955）則開闢了研究現代漢語語法的新領域，並同施普林欽（1907-1974）等蘇聯漢學家一起探索漢字拉丁化的問題。波利瓦諾夫（1891-1938）進行了漢語語音語法研究的實踐。科洛科洛夫（1896-）編成了新的《漢俄辭典》。而弗盧格（1893-1942）甚至已從事中國圖書版本學的研究，寫出中國印刷史。斯卡奇科夫（1892-1964）別出心裁編成《中國書目》，把1730年至1930年俄國和蘇聯所搜集到的有關中國的書籍、論文及資料（已發表的）盡數編列出來。

據不完全統計，在1917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裡，蘇聯出版的漢學成果就有約一百部書，大大超過19世紀俄國的漢學成果。蘇聯漢學成果有以下三個方面。

1. 對當代中國的研究佔有日益顯著的地位

研究新中國經濟問題的有：馬斯連尼科夫（1894-1968）、斯拉德科夫斯基（1906-1985）、科諾瓦洛夫（1928-）。研究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格利布拉斯（1930-）和利沙·屈沙強（1932-）、曾任外交部副部長

的賈丕才（卡皮察，1921-），還有鮑利索夫。

研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如尤里耶夫（1918-）、格盧寧（1924-）、傑柳辛（1923-）、卡瓦廖夫和維諾格拉多夫（1923-），還有阿斯塔菲耶夫（1908-）和薩波斯尼科夫（1907-）。

2. 史學領域研究的範圍相當廣泛

既有通史，也有斷代史（古代、中古、近現代），還有類別史（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甚至史學史）。如梅利克謝托夫（1930-）和蘇哈爾丘克（1927-）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克留科夫（1932-）、伊茨（1928-）、杜曼（1907-）、佩列洛莫夫（1928-）、瓦西里耶夫（1930-）重點研究中國古代史，包括中國文明、種族和民族的起源，民族社會和階級社會的產生與發展等。研究中世紀史的康拉德（1891-1970）、斯圖仁娜（1931-1974）、斯莫林（1930-）和西蒙諾夫斯卡婭（1902-1972）也做出很大的成績。特別突出的是康拉德院士。研究中國古代外交史的施泰因（1890-1964）、研究西夏史的克恰諾夫（1932-）和研究女真族歷史的沃羅比約夫（1922-）。

近現代史方面有葉非莫夫（1906-1980）、伊柳舍奇金（1915-）、布羅茨基（1907-）、克雷莫夫、齊赫文（齊赫文斯基，1918-）院士。蒙庫耶夫（1922-）翻譯中國歷史文獻有突出的貢獻，為蘇聯漢學界所重視。

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有出生於浙江寧波的楊興順（1904-）、謝寧（1918-）。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的有郭紹棠（克雷莫夫）等。從事史料學工作的有別遼茲內（1915-）、尼基福羅夫（1920-）和斯卡奇科夫。

3. 語文學成果非常顯著

從龍果夫開始就注意對現代漢語的研究，索恩采夫（1928-）、科羅特科夫（1908-）、羅日傑斯特文斯基（1926-）、雅洪托夫（1926-）對漢語結構問題很有研究。魯緬采夫（1922-）、戈列洛夫（1911-）、索恩采娃（1926-）、紮多延科（1924-）、科托娃（1927-）、佳普金娜（1928-）、舒托娃（1927-）、楊基韋爾（1925-）等，對漢語語音學、詞法學和句法學很有研究。索羅諾夫（1929-）、佐格拉芙（1931-）和古列維奇等，則探

討中世紀的漢語結構，包括西夏語。克留科夫（1932-）研究殷文，諾夫戈羅茨基（1928-1977）和索科洛夫研究漢語方言。施普林欽在漢語的社會語言學，雅洪托夫在古漢語語法，茲沃諾夫和熱列賓在漢字的機器翻譯問題上大有進展。工具書方面，鄂山蔭（1900-1982）主編的《華俄辭典》頗具權威性。伊薩延科（1914-1965）的《漢俄發音詞典（試編）》也很有影響。敦煌學家孟列夫（緬希科夫，1926-）和《寶卷》專家斯圖洛娃（1934-）也已知名。查瓦茨卡婭（1930-）已寫出《米芾》、《齊白石》等論著。

4. 為後半世紀培養一代文學名家

其中有費德林（1912-）、艾德林（1909-1985）、索羅金（1927-）、波茲涅耶娃（1908-1974）發表文學史著作，康拉德（1891-1970）在比較研究，費什曼（1919-1986）、謝曼諾夫（1933-）、沃斯克列辛斯基（1926-）在古典小說，艾德林、謝列布里亞科夫（1928-）在古典詩歌，李福清（1932-）、斯別施涅夫（1931-）在民間文學和俗文學，李謝維奇（1932-）、戈雷金娜（1935-）在古代文藝思想和文論，孟列夫、索羅金在古典戲劇，切爾卡斯基（1925-）、彼得羅夫（1929-1986）、施奈德（1921-1981）、蘇霍魯科夫（1929-）、熱洛霍夫采夫（1933-）、謝曼諾夫在現代文學，蓋達（1926-）、謝羅娃（1933-）在戲劇都有研究成果。帕納秀克（1924-）、羅加喬夫（1900-1981）、科洛科洛夫（1896-1979）、什圖金（1904-1964）等則在翻譯文學名著方面有突出成績。在這三十多年裡有大批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譯作出版。

五、20世紀下半葉現代漢學趨向繁榮

（一）加強和擴大漢學隊伍

20世紀後期研究機構數量劇增，以科學院系統的三大研究所——莫斯科的遠東研究所、東方學研究所和聖彼德堡的東方文獻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五強」為主，新增烏拉爾、新西伯利亞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遠東大學等高校，也已各自

建成漢學中心。

其中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的高校，以及科學院遠東分院的相關研究所，形成遠東的一大漢學重鎮。

漢學隊伍改變了20世紀前期僅有一位院士阿翰林為整個漢學界領袖的局面，阿氏的門生、後輩已有4人當選為院士，分別成為漢學各分支學科的奠基人和領軍人物。史學為齊赫文和米亞斯尼科夫，哲學為季塔連科，文學為李福清。

還有幾位通訊院士和大批具有博士副博士以上高級學銜的漢學家，據統計至2008年已有612人，比90年代初的505人，增加了100多位。

50年代以後出生的一批漢學家開始嶄露頭角，如，著有《中國古典哲學方法論》的科勃澤夫，《孔子傳》的作者馬良文，《高僧傳》的譯者葉爾馬科夫，研究佛教文化的托爾琴諾夫，《中國文化史》的作者克拉芙佐娃，寫成專著《王維創作中的禪佛思想》的達革丹諾夫，研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洛曼諾夫，東方文獻所所長波波娃，以及莫斯科大學的卡爾波夫、劉華夏，聖彼得堡大學的羅季昂諾夫，遠東大學的列別捷娃副教授，赤塔的科羅文娜副教授，以及漢學書籍出版家阿里莫夫等，均已在8、90年代成名。他們給俄國漢學帶來了新成果、新氣象。

80年初，中蘇恢復了停止二十年的交往之後，引起漢學家們重新勃發的熱情，他們經歷了50年代高昂的交流熱潮，6、70年代的相對沉寂之後，竭力要找回逝去的20年代時光。這一時期順著50年代的潮流，以更大的熱情推進，竟致8、90年代興起了「中國傳統文化熱」，直到21世紀初。

（二）譯介中國文學的熱潮

1. 50年代出現了浩蕩的「洪流」

這十年裡出版了什圖金的《詩經》首次全譯本，郭沫若、費德林主編的四卷本《中國詩歌集》，所選詩歌上起古代下迄20世紀50年代。這部由兩國學者合作編選的集子，第一次向蘇聯讀者展示了中國詩歌全貌。其選擇之精全，迄今仍為中國國外所僅見，還有一些著名

詩人的單行本，如艾德林譯的《白居易詩集》，奇托維奇譯的《杜甫詩集》、《李白抒情詩集》和《王維詩集》，阿列克謝耶夫等譯的《屈原詩集》等。幾部重要的古典小說也都有了俄譯本：帕納秀克譯的《三國演義》和《紅樓夢》，羅加喬夫譯的《水滸傳》以及他同科洛科洛夫合譯的《西遊記》，沃斯克列辛斯基（華克生）譯的《儒林外史》，還有費什曼等譯的《鏡花緣》。有些甚至在西方都不大譯介的清末章回小說也出了俄譯本，如謝曼諾夫譯的《老殘遊記》和《孽海花》等。現代作家的作品，不但著名的大作家如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葉聖陶、丁玲等都有了俄譯本，而且一些在西方還很少介紹的作家如馬烽、李准、周立波、楊朔、艾蕪、陳登科、秦兆陽、馮德英等也都得到譯介。

綜合性的文學史書則有費德林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觀》、《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綱要》，艾德林的《論今日中國文學》。作家專論有波茲涅耶娃的《魯迅》和《魯迅的生平與創作（1881-1936）》，索羅金的《魯迅世界觀的形成——早期的政論作品和《吶喊》》，謝列布里亞科夫的《杜甫評傳》，費什曼的《李白的生平和創作》，彼得羅夫的《艾青評傳》。

2. 60-70 年代擴大翻譯的範圍

由於有一代中年漢學家的努力，從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中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仍有了長足的進展。

古典詩詞仍然是翻譯的重點。陸續出版的大詩人作品有：《白居易抒情詩集》和《白居易詩集》，《陶淵明抒情詩集》和《陶淵明詩集》（以上均艾德林譯），曹植《七哀詩集》（切爾卡斯基譯），《陸遊詩集》和《蘇東坡詩詞集》（均戈魯別夫譯），李清照《漱玉詞》和《辛棄疾詩詞集》（均巴斯馬諾夫譯）。也有多人合集的詩選，如《中國古典詩歌集》（艾德林譯）和《梅花開（中國歷代詞選）》（巴斯馬諾夫譯）。一些不常被人注意的近代詩人也有人翻譯，如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謝曼諾夫譯）。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詩人參加了翻譯，使譯詩增色不少。著名女詩人阿赫馬托娃譯屈原的《離騷》，詩人吉托維奇譯《杜甫抒情詩集》、巴德爾金譯謝靈運、鮑照的詩等。

翻譯小說方面，既有舊小說和筆記，如六朝小說干寶的《搜神記》（吉什科夫譯），《紫玉》（中國一至六世紀小說集）（李福清等譯）；《唐代傳奇》（費什曼、吉什科夫譯）和《浪子與術士（又名《枕中記》）》（紫科洛娃譯）；沈復的《浮生六記》、瞿佑的《剪燈新話》（均戈雷金娜譯）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費什曼譯）；也有通俗小說（白話小說）。如錢采的《說岳全傳》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均帕納秀克譯）；《今古奇觀》（維爾古斯、齊別羅維奇譯）、《十五貫（中國中世紀短篇小說集）》（左格拉芙譯）和《碾玉觀音》（羅加喬夫譯）等。還有不久之前才出版的羅貫中、馮夢龍《平妖傳》（帕納秀克譯）。此外，《金瓶梅》（馬努欣譯）已在 1977 年出了俄譯本。蘇聯也同在我國一樣，還為少年兒童出版了《水滸傳》、《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的節譯本或縮寫本。

翻譯散文作品，如《山海經》（楊希娜譯），司馬遷《史記》（維亞特金、塔斯金譯），《韓愈柳宗元文選》（索科洛娃譯），陸游《入蜀記》（謝列布里亞科夫譯）等。

翻譯戲曲和民間文學方面。重要的有王實甫的《西廂記》（孟列夫譯），《元曲》（彼得羅夫編、由斯別斯涅夫、馬里諾夫斯卡婭、謝列布里亞科夫、孟列夫、費什曼等人翻譯）計收入關漢卿的《竇娥冤》、《望江亭》和《單刀會》，白樸的《牆頭馬上》和《梧桐雨》，康進之的《李逵負荊》，馬致遠的《漢宮秋》。李好古的《張生煮海》，鄭光祖的《倩女離魂》，張國賓的《合汗衫》，石君寶的《秋胡戲妻》等。在《世界文學叢書》的《東方古典戲劇》卷（索羅金、雅羅斯拉夫采夫、戈魯別夫等譯）中則收入關漢卿的《竇娥冤》，洪昇的《長生殿》（片段），孔尚任的《桃花扇》（片段），湯顯祖的《牡丹亭》（片段），鄭廷玉的《忍字記》。民間文學方面有袁珂《中國古代神話》的譯本（魯波——列斯尼琴科、普濟斯基譯）和李福清為《世界各民族的神話》編寫的二百餘則中國神話。

還有一種通俗文學的形式，即變文。孟列夫（緬希科夫）就列寧格勒珍藏的敦煌文獻資料，作細心的整理和研究，整理譯注《維摩詰經變文·十吉祥變文（敦煌寫本）》（譯注），《影印敦煌贊文附宣講》（整理、作

序)，《雙恩記變文(敦煌寫本)》(譯注)，《妙法蓮花經變文》(譯注)。此外，還有《寶卷》的譯本，繼《普明寶卷》(兩卷本，斯圖洛娃譯)之後，又出了《百喻經》(古列維奇譯)。

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由切爾卡斯基編譯出版的幾本詩集恰好組成了一個介紹近 6、70 年中國詩歌的完整系列：《雨巷(20-30 年代中國抒情詩)》、《五更天(30-40 年代中國抒情詩)》、《四十位詩人(20-40 年代的中國抒情詩)》和《蜀道難(50-80 年代的中國詩歌)》。入選的詩人有一百多人，規模相當可觀。新譯的小說也不少，有茅盾的《幻滅》(伊萬科譯)，老舍的《貓城記》和《趙子曰》(均謝曼諾夫譯)，張天翼的《鬼土日記》(切爾卡斯基譯)，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和《小二黑結婚》(羅果夫、克里夫佐夫譯)，錢鍾書的《圍城》(索羅金譯)，以及幾本短篇小說集(分別選入魯迅、茅盾、巴金、葉聖陶、丁玲、王魯彥、王統照、謝冰心、吳祖湘、許地山、老舍等人的小說)。此外，還有《瞿秋白選集》(施奈德譯)和鄧拓的《燕山夜話》(熱洛霍夫采夫)。

七十多年來蘇聯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已為數不少，有可能將俄譯本系列化，80 年代著手出版規模宏大的四十卷本《中國文學叢書》。

3. 80 年代以降的中國當代文學熱

翻譯作品數量越來越多。已彙編的成書，中國的中短篇小說集有 7 部，收入小說近 60 篇，詩集一部，收入 22 位詩人的 30 餘首詩，還有中、長篇小說 3 部。

(三) 俄羅斯漢學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特點

1. 歷時久而且持續不斷。俄國從 18 世紀下半葉由漢、滿文直接翻譯中國哲學、歷史、文化典籍算起，也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如加上此前由法文及其他歐洲文字轉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則時間更長。長時間內翻譯和研究一直持續不斷，期間還出現過四次引進中國文化的熱潮。頭兩次是 18 世紀初在俄國社會上各階層刮起的「中國熱」和 19 世紀下半葉漢學界的譯介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後兩次在 20 世紀 50 年代和 80 年代，

主要表現形式均為大規模譯介文學作品和全面的多途徑的文化交流。

2. 研究的範圍廣、成果多。從經典書籍到民間文化，從考古文物到歷代工藝品，從儒、釋、道學到宗教信仰，從宏觀上的國家政治體制、歷史沿革、皇朝更替、典章制度到微觀上細小工藝的考察，直至服飾特點、陶器和古錢幣年代的鑒定等都有人研究，並且寫成專著。其中還有關於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及文化研究的著作。
3. 學術研究已形成傳統、蔚然成風。漢學人才雖然也有不少是從事實際工作，但學術界已養成一種風氣——似乎不向學者型的方向發展就不足以成為知名的漢學家。因而凡是想要多少作出點貢獻的人，都極為重視資料收集，力求多而全；堅持長期研究，務求深而細，很多人師承瓦西里耶夫院士和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直至形成學派。因而在俄國，搞專業研究的人自不必說，即便非專業研究的人也努力成為漢學家。這個方面可以今人費德林(1912-2000)為例。他的本職是外交工作，在蘇聯外交界任職三十多年，曾任蘇聯駐華使館參贊、駐日本大使、常駐聯合國及安理會代表，官至外交部次長。他本職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在業餘時間從事漢學研究。當年北京大學教授曹靖華在談到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時，曾贊許地說道：「你看費德林在重慶的時候，公務那麼忙，公事包裡還隨時帶著中國文學作品，一有機會遇到中國人，就請教和討論起來。」費德林就是靠勤奮、恆心和善於利用時間而作出成就的，可以戲稱他為「業餘的」漢學家。但他卻以優異成績當選為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當他 80 歲時，他寫的中國文學論著單行本就有 35 本。
4. 整個漢學界顯得有組織、有規劃，研究專案都有分工。還有人經常注意梳理本學科進展的歷史、發展的現狀，或寫出發展史和學術研究總結，或編出漢學家辭典和漢學書目總匯。前者如斯卡奇科夫和米亞斯尼科夫著《俄國漢學史綱要》(迄於 1917 年)，後者如密麗班德編《俄國東方學家辭典》。這些工作都可以為本學科提供資訊，指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